



莊蘊寬戎裝照

熊希齡很快就拿着草稿來到「惜陰堂」。孫、黃以及見到這份計劃書的人，無不稱其精確可用。趙鳳昌更是欣然色喜，就正式推薦此藍本為臨時政府的財政討論稿，最終定為財政計劃。但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未任用熊希齡為財務總長，用了自己的親信。而熊後來卻在民國袁世凱新政府擔任財政總長，內閣總理。

作為進入南京臨時政府擔任要職的同盟會會員，除胡漢民、黃興等少數人全力支持孫中山外，不少人甚至總跟孫中山對着幹，使臨時大總統苦不堪言。革命黨自己人處處攔局，其他立憲派官宦人士對此等渙散政府更加興味索然。交通總長湯壽潛僅參與幾次會議，就躲進上海租界不問事；司法總長伍廷芳忙於南北議和，無暇前來；內政部長程德全稱病住上海醫院休養生息；實業總長張謇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的第二天，跟孫中山進行過一次長談，了解孫中山的建國方略之後，他在日記中以無奈的口語寫道：「與孫中山談政策，未知涯畔。」意思是着不着邊際。由是觀之，南京臨時政府的倒台實有其必然性在焉。

同盟會革命黨人內部不和，對孫大總統多方掣肘，顯然並非一朝一夕，而是其來有自。事實上同盟會一九〇五年成立，一九〇七年便因內部爭鬥而鬆散。孫氏革命最重要方法之一，是在海外策動國內的軍事起義，對清朝施之武力。但軍事起義非同小可，有兩個要素必不可少，第一是要命，第二是要錢，而命和錢上哪兒去找？就算命好找，那錢又怎麼找？命可以奉獻，武器卻是要用錢去買的。

此外，起義的發動應該是謀定而動，非常慎重的事情。否則，拿別人的命去以卵擊石，頻繁發動根本無法取勝的起義，當然令他的部下頗有看法。

茅家琦領銜編著的《中國國民黨史》中有如下記載：南方六次起義失敗後，孫中山仍然堅持原來的戰略方針，於一九〇二年二月再次發動廣州新軍起義，亦遭失敗。大部分革命黨人都流亡到了東京，個個灰心喪氣，「黨事已無人過問」。孫中山正在美國，聞日本內閣將有變動，想趁此機會爭取與日本政府改善關係，於是在六月十日趕到日本。黃興、趙聲等亦到東京。十一日，在東京會見廣州新軍起義失敗的革命黨人。當時譚人鳳向孫中山提出，要求他召開會議，「改良黨務」。孫亦表示同意。接着宋教仁住商具體方案時，卻吃了閉門羹。孫中山對宋教仁說：「同盟會已取消矣，有力者盡可獨樹一幟。」宋教仁大吃一驚，問何故。



吳 歡

孫中山說：「黨員攻擊總理，無總理安有同盟會？經費由我籌集，黨員無過問之權，何得執以抨擊？」宋教仁氣得沒辦法了，立即報告譚人鳳。孫中山為什麼如此對待宋教仁呢？事即一九〇八年倒孫風潮中，宋教仁曾一度支持章太炎的意見，孫中山對此尚耿耿於懷，故出此言。譚人鳳聽到後大為惱火，第二天與教仁一起去找孫中山，孫仍持此種論調。譚人鳳憤憤地說：「同盟會由全國志士孫中山組織，何得一人言取消？總理無處罰黨員之規條；陶成章所持理由，東京亦無附和，何得怪黨人？款項既係直接運動，然用公家名義籌來，有所開銷，應便全體與之，何云不得過問？」孫中山只好說：「此事可容日約各分會會長自議。」

結果過了幾天，孫中山不辭而別。「改良黨務」的事就不了了之。

此事大傷長江中部各省革命黨人之心，大家紛紛議論，決定自行以長江中下游為中心，進行起義發動工作。

相比較革命黨內部人士而言，江蘇都督莊蘊寬、對孫、黃主持的臨時政府，給予了肝膽相照的傾力支持。從《趙鳳昌藏札》第十卷查到的一封信蘊寬執筆與趙鳳昌一起給湯壽潛的信，信內容為共和政府積極籌款購買軍械。

從中可以看出趙、莊二人之關係確非一般。另在辛亥民國檔案要件，發起人簽名中，亦可發現趙、莊二人每簽必列一起，攜手操縱全盤。互為依託，共商進退。莊蘊寬年輕跑到前站，趙鳳昌年長，加之有腿疾行動不便，退居幕後。莊在民國初建便委以江蘇都督關鍵一職，輔佐孫、黃。當時時局要人都很清楚，莊蘊寬實際上乃是趙鳳昌的代言人。二人友誼也一直接繫到終老。

另據常州市文史資料第十一輯，《莊蘊寬傳記》（作者陳吉龍）所載：莊蘊寬上任之始延請馬伯柏為民政總長、黃炎培為教育總長，參謀部總長黃興與莊通曉軍事，請莊留南京襄助軍務，因此臨時都督府設南京。莊主蘇政三個多月，至孫中山卸任大總統為止。

對孫中山、袁世凱南北兩位政治人物的態度，趙鳳昌與張謇並不一致。張謇由於跟袁世凱的歷史淵源，加之對南北雙方真正實力對比的不認可，因此在政治的寄託上，明顯地傾向於袁。

趙鳳昌則從心理上更趨向於支持具有進步思想、代表將來中國希望的孫中山、黃興。除此之外，還有一層原因，乃是他對袁世凱有很深的宿怨，認為袁人品不好。趙鳳昌與袁世凱的宿怨，因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一八九八年底，因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在北京菜市口。《民國諸葛趙鳳昌與常州英傑》之六）

不措意……」幾位收信的作家中，唯獨郁達夫給了沈從文回應——親自看望了他，請他吃了一頓飯，並送給一條冬天不可或缺的圍巾，還有一篇針對當時黑暗的舊社會表達無限憤懣的文章——《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

後來郁達夫便將這封信登載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晨報副刊》上，信中這樣寫道，「像你這樣一個白臉長身、一無依靠的文學青年，即使將麵包和淚吃，勤勤懇懇的在學窗下住它五六年，難道你拿畢業文憑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會下起珍珠白米的雨來的麼？」信中充滿着對當時舊社會的種種憤懣。講這些給沈從文聽，當然不是怕沈向他借錢，而是以自己一個擁有留學生資格、又在大學教書的人的境況，來證明「目下的中國社會的不合理，以大學畢業的資格來餬口的你的那種見解的錯誤罷了」。

在這種現實狀況下，一個沒有錢、沒有靠山、卻抱着美好希望的文藝青年，郁達夫能告誡他什麼呢？「現在為你計，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點事情幹幹」。可是，沈從文這樣的青年，能幹點什麼呢？想到這裡，郁達夫有些激憤起來，他帶着強烈情緒結：「然而土匪你是當不了的……所以最上的上策，於你是不成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去罷，去製造炸彈去罷！但是革命是不是同割枯草一樣，用了你那裁紙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嗎？炸彈是不是可以用了你頭髮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換的襪底裡的腐泥來調和的呢？這些事情，你去問上帝去罷！我也不知道……」

這番話，顯然是懷着對當時黑暗社會的強烈不滿情緒抒發出來的，所以有譏刺、有調侃、有激憤，但是，情感卻是真實的。

雖然文章如此寫，可是，郁達夫在沈從文的文學道路上，還是給了他最切實的幫助。一九二五年，因了投稿，經郁達夫介紹，沈從文與徐志摩相識，進而得到徐的賞識與大力學薦，為沈走上文學坦途奠定了重要基礎。這，沈從文也沒有忘懷。一九三六年，當出版一本《從文小說習作選》時，沈在序言中有這樣一段充滿感激之情的話：「這樣一本厚厚的書能夠和你們見面，需要出版者的勇氣，同時還有幾個人，特別值得記憶，我也想向你們提提：徐志摩先生，胡適之先生，林罕平先生，郁達夫先生……這十年來沒有他們對我的種種幫助和鼓勵，這本集子裡的作品不會產生，不會存在。說不定就臥在什麼人家的屋簷下，癟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爛了……」

沈從文便在那麼艱苦的條件下，走出了一條他自己的文學道路。這位文學天才原來沒念過中學，念小學時也是天天逃課，要不是這時候在北大「旁聽」，真難以想像他後來能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可或缺的成就卓越的文學大師。這位傑出的小說家和歷史文物研究專家一生共出版過三十多部短篇小說集和六部中長篇小說，是少數幾個擁有世界性聲譽的現代中國作家之一。

沈從文，旁聽在北大

鄭球洋

裡混一頓，或者除帳：在公寓和小飯館吃上幾次。（數年之後，一次他從上海返北京，還在一家小飯館的欠帳牌上，看到「沈從文欠若干元」的字樣。）為了生存，也為把自己思想和生存的特別經歷表達出去，在這段時期，沈從文開始拚命寫作起來。可是，最初他向北京多家報刊寄出的大量稿子，全部石沉大海。這還不算，在《晨報、副鵲》的一次編輯聚會上，他投寄的十數篇文章被連成一個長條，攤在桌上，為眾人奚落。

生活的窮困和精神上不被認同，一般情況下總會很快毀滅一個人的。可沈從文卻有着湘西人的深刻忍耐和倔強，他仍將他的生活閱歷和生命感受，寫成文字，向那些大小報刊一再投去。

瀕臨絕望的沈從文，開始向京城知名作家寫信，傾吐心聲。沈從文向郁達夫投寄的信，當時並沒有保存下來，可在他當時寫作的其他文章中，錄下了一封這樣的求助函。信函的內容是，也應當是向郁達夫傾吐的主要意思，「郁達夫先生：在你看我信以前，我先在這裡向你道歉，請原諒我！」他這樣描述自己的狀態：「一個人，平白無故向別一個陌生人寫出許多無味的話語，妨礙了別人正經事情；有時候，還得給人以不愉快，我知道，這是一樁很不對的行為。

不過，我為了求生，除了這個似乎已無第二個途徑了！所以我不怕別人討厭，依然寫了這信。我很為難。因為我並不曾讀過什麼書，不知道如何來說明我的為人以及對於先生的希望。我是一個失業者——不，我並不失業，我簡直是無業人！我無家，我是浪人——我在十三歲以前就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了。

過去的六年，我只是這裡那裡無目的地流浪。我坐在这不可收拾的破爛命運之舟上，竟想不出辦法去找一個一年以上的固定生活。我成了一張小而無根的浮萍，風是如何吹——風的去處，便是我的去處。湖南，四川，到處飄，我如今竟又飄到這死沉沉的沙漠北京了。」不僅生活，「一個陌生人，在這茫茫人海中，更何處去尋找同情與愛？」他希望能尋覓到文學創作上的知音，得到鼓勵與支持，同情與關愛。

因為面對的是作家，沈從文專門寫道：「我以為『能用筆寫他心、同情於不幸者的人，不會拒絕這樣一個小孩子』，這愚陋可笑的見解，增加了我執筆的勇氣。」可他同時又不敢抱多大希望，「先生對這事，若是懶於去理會，我覺得並無什麼要緊。我希望能夠像在夏天大雨中，見到一個大水泡為第二個雨點破滅了一般的



文化什錦

一九二二年夏，為了使自己的

生活「多見幾個新鮮日頭，多過幾個新鮮的橋……」，剛二十歲出頭的沈從文決定脫下軍裝，「儘管向更遠處走去，向一個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賭一注看看……」，風塵僕僕地從湘西軍營跑到北京，住西西會館，「進到一個使我永遠無從畢業的學校，來學那課永遠學不盡的人生了」。

但是，到得北京沒多久，沈從家鄉鄉來的「湘西王」陳渠珍所資助給他的盤纏便告罄，後來便搬進銀閣胡同，到北大成了不註名的旁聽生。

北京大學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多種社會思潮的發源地，歷史上就有旁聽的傳統。旁聽生是百年名校北大的一道特殊景觀。這一批並不屬於大學編制內的社會群體，給北京大學「兼容並包」的辦學風格增添了頗具平民色彩的詮釋。

北大老校長蔡元培將「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辦學方針付諸實踐，倡導的是「無人不當學，而亦無時不當學」，要求「各學堂有缺額時，均得收旁聽生」，通過開辦校役班、平民夜校，招收旁聽生、選科生等方式，盡可能地讓北大的教學資源惠及平民大眾，甚至對沒有經過任何合法手續的「旁聽生」、「偷聽生」也敞開懷抱。「來者不拒、去者不追」，這樣的浪漫主義，唯老北大開風氣之先。

自此，北大便開始有了旁聽生，而旁聽風之甚更可謂「前無古人，後啓來者」。也有人指責旁聽制度搞得北京大學亂糟糟，蔡元培有次問老下屬：「守常，你說我這樣辦學行嗎？」李大釗點了點頭：「這就叫『勝地自來無定主，大抵山屬愛山人』。」

從蔡元培時代的北大開始至今，旁聽生傳統便源遠流長，談及這一傳統，曾著有《老北大的故事》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說：「理想中的大學，應該是沒有圍牆的。任何一個公民，只要有時間、有精力，聽得懂相關課程，大學就應該向他們開放。」

再說沈從文，在幾乎沒有任何經濟支援的境況下，忍着飢餓，挨着北京嚴酷的寒冬，這個倔強的湘西人開始向文學領域進發。可是，學歷太低，沒有資歷，想以文學來養活自己，幾乎成了虛幻的可笑的幻想。

在生活上，沈從文困窘到了極點。他幾乎沒有任何經濟來源，連最基本的吃飯問題，都是這裡蹭一頓，那

。」可強中也有弱，長中也有短，哪個都不是十全十美，到底應該嫁給誰？

這情形活像現在的「剩女」們所面臨的問題。有錢的沒有才，有才的沒有貌，有貌的沒有房，有房的沒有德，有錢才有貌有德的倒是有了，可早已跟別人結了婚。於是橫下一條心，寧等不屈，寧缺勿濫。其實，嫁人就像買股票，誰敢保證肯定升值？相反，倒是有很多當初被美女們視為「垃圾股」的男人，最後風光無限。也讓那些心高氣傲的女人明白，幸福是釀出來的，不是嫁出來的。丁玲在文章中，向未嫁的女士們提出了四點建議：第一、不要讓自己生病，沒有一個

咬春

戴永夏



飲食男女

起來特鮮；將椿芽加鹽揉勻，蘸上麵糊，放進油鍋裡炸黃，便是有名的「炸香椿魚」。「香椿魚」外焦裡嫩，鮮香可口，是濟南的一道傳統名菜。還有椿芽炒雞蛋、醃香椿也都風味別具，深受歡迎。那果說北京人「咬春」，還真有在盼之類象徵意義的話。那麼濟南人的「咬春」，則其實是在盼的是在感受春春的溫暖，享受春的美好了。

不過，時代不同，「咬春」的滋味也有苦有甜。記得童年在故鄉，一到春天，家鄉人也爭相「咬春」，但那「咬春」的滋味卻十分苦澀……

鄉親就只能靠米糠、野菜和樹葉充飢。春天一到，楊柳剛剛長出綠葉，飢腸轆轆的人們就爭相將樹葉採回家，放在鍋裡一煮，再用清水浸泡，然後調下一點點鹽之類，蒸成黑色的菜糰子。這菜糰子吃到嘴裡，又苦又澀，難以下嚥。記得每當我們皺着眉頭看着菜糰子打炕時，樂觀的祖父總愛用流行或自編的諺語，來安慰我們：「咬春咬春，咬出黃金！」「吃得苦中苦，才能享清福！」「別看這些樹葉子苦，越嚼越香，苦中有甜呢！」

現在想想，樸實的祖父說的話，並不都是自我安慰。儘管我們從未從樹葉中咬出過黃金，但他那「吃得苦中苦，才能享清福」「苦中有甜」「苦盡甘來」之類的话，卻極富生活哲理。



如是我見

說出此種「可愛」的話可以理解。插花上癮的「花癡」袁宏道則把話說得更絕，「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皆無癖之人耳」。

自古名士多怪癖，此話不假。建安七子的代表王粲，平生愛學鹽豉，他死後出葬時，曹丕號令所有送客齊聲鹽鳴；對「口技」同樣鍾情的還有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他愛吹口哨，美其名曰為「嘯」，他還有一絕活便是「青白眼」，看不順眼的一律「翻白眼」，被他「青眼」有加的大帥哥嵇康卻獨愛打鐵。同為七賢之一的劉伶卻有邊走路邊喝酒的嗜好，讓一隨從背着鋤頭跟着，「死便埋我」；他還有在屋內「裸奔」的習慣，朋友怪之，他駁道，我以天地為房屋，房屋為衣服，你怎麼跑進我衣服裡了？……當然這些例子只是極端，大多數文人名士的嗜好都算是「雅癖」，屬於白居易的「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那樣。

普通人的嗜好，當然比文人雅士之「癖」要普通些。譬如我，也就是愛讀讀書、看看球、聽聽音樂而已，也沒到為之瘋狂的程度。初次讀到張岱的話，總覺得其有說之未盡的成分。如果把「癖」理解成是一種興趣愛好，誰沒有愛好？打打牌、摸摸麻將算不算？玩玩遊戲炒炒股算不算？另外，出於什麼目的去喜歡做一件事，才算是「癖」，他也沒交代清楚。但仔細品讀，就能體會其中深味。蝶庵居士所說的「癖」，是指一種非功利的，發自內心的，甚能超越現實的喜好。也就是說，一個人的愛好無論是雅還是俗，只要是他的深情之所注、寄託之所在，都值得我們尊重。或許每選擇一個愛好，背後都要付出代價。不說那些執著追求理想，為做一番救國救民大事業甘受冷落甚至受難的聖賢們，就說咱凡人，熬夜看一場球也要付出第二天上班精神萎靡的代價。有「癖」的人為什麼可交呢？不僅是志同道合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有愛好的人更「深情」，一個人如果可以為癡迷一件事，而放棄許多甚至不計代價，至少說明他是性情中人。或者是有原則的人，他對愛好的「深情」同樣也可能移植於「友情」之上。因此，此人可交也。

當然，張岱說人無癖不可與交，這話說得有些過火。對啥事都不過度執著之人，並不就意味着他是個圓滑、有心機玩權術的人。還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對啥事都沒興趣的厭世之人，一種可能是固守中庸之道的老好人，老好人四平八穩，以人際平衡作為處事哲學。雖非不可以交，不過前者無趣，後者更適合做導師，嚴格來說，我還是喜歡跟有「癖」之人交朋友。

人有癖可與交

葉樹濃

春天是個誘人的季節。春光春色，處處惹人喜愛；萬紫千紅，樣樣牽人情思。自古以來，人們迎接春天的形式也多種多樣：迎春、迎春、迎春，迎春……還有為形象者，謂之「咬春」。

咬春又名吃春，即在初春時節，吃一些象徵春意的新鮮菜蔬之類的食品，以迎接新春的到來。這種習俗，在全國各地流傳很廣。北京人每年在立春之日就開始吃春；立春後出遊，謂之「討春」。而唐代的《四時寶鑑》記載：「立春日，都人做春餅、生菜，號春盤。」這種在立春日食春餅、春餅的習俗，一直延續到千多年後的當今。每到立春這天，老北京人都要弄來生蘿蔔、白菜心、鮮黃瓜、黃芽菜等的當今，做成春盤；再用白麵做成薄餅，放在平底鍋上烙成撲鼻香的春餅。在餅上抹上麵醬，再捲上春盤中的生菜，便可有滋有味地品嚐春的味道了。俗信立春日食春盤、春餅，可以解春困，避牙疾。吃過春盤、春餅，表示嚴冬已去，萬紫千紅的春天就要來了。

跟北京人相比，濟南人的咬春習俗要實際和實惠得多，時間也比北京的晚。

濟南的咬春主要是指食鮮香椿芽。香椿是一種長壽的木本植物，其嫩葉不但營養豐富，食用價值高，而且清香撲鼻，深為人們所喜愛。明代人屠本峻就任其《野菜箋》中讚詠香椿道：「香椿香椿生無花，葉嬌枝嫩成校尉。不必海上大椿八千歲，歲歲可採其芽。」說明食用椿芽由來已久。而在濟南，每到春暖花開之際，那被春風喚醒的椿樹剛剛吐出紫油油的嫩芽，城郊的鄉民們便小心地將椿芽採摘下來，打成小捆，運進城裡，在農貿市場上或沿街叫賣：「椿芽嘍！」

「一聲聲脆甜的叫賣聲，瀰漫在春風裡，給人們送來陣陣誘惑，使人未曾嘗過春風就留香。買回來，放一根嘴裡一嚼，清香直透心脾。將椿芽洗淨晾乾，又可做成各種美味佳餚：椿芽拌豆腐，做起来方便，吃起來特鮮；將椿芽加鹽揉勻，蘸上麵糊，放進油鍋裡炸黃，便是有名的「炸香椿魚」。

還有椿芽炒雞蛋、醃香椿也都風味別具，深受歡迎。那麼果說北京人「咬春」，還真有在盼之類象徵意義的話。那麼濟南人的「咬春」，則其實是在盼的是在感受春春的溫暖，享受春的美好了。

不過，時代不同，「咬春」的滋味也有苦有甜。記得童年在故鄉，一到春天，家鄉人也爭相「咬春」，但那「咬春」的滋味卻十分苦澀……

鄉親就只能靠米糠、野菜和樹葉充飢。春天一到，楊柳剛剛長出綠葉，飢腸轆轆的人們就爭相將樹葉採回家，放在鍋裡一煮，再用清水浸泡，然後調下一點點鹽之類，蒸成黑色的菜糰子。這菜糰子吃到嘴裡，又苦又澀，難以下嚥。記得每當我們皺着眉頭看着菜糰子打炕時，樂觀的祖父總愛用流行或自編的諺語，來安慰我們：「咬春咬春，咬出黃金！」「吃得苦中苦，才能享清福！」「別看這些樹葉子苦，越嚼越香，苦中有甜呢！」

現在想想，樸實的祖父說的話，並不都是自我安慰。儘管我們從未從樹葉中咬出過黃金，但他那「吃得苦中苦，才能享清福」「苦中有甜」「苦盡甘來」之類的话，卻極富生活哲理。

六十年前「嫁人難」



書林擷趣

汪金友

一九四二年身在延安的著名女作家丁玲，寫了一篇題為《「三八節」有感》的文章。其中很大的篇幅，談了女人的「嫁人難」的問題。

丁玲說，女人總是要結婚的。但當時的延安，只有四種男人可供選擇。「騎馬的」多是領導幹部，但年齡偏大；「穿草鞋的」多是老戰士，但文化偏低；「總務科長」具有後方的穩定，卻少有前線的戰功；「藝術家們」多才多藝，但太多愁善感。陝北有句俗語：「扛棍要扛個長的，攀件要攀個強的